

大师的门



故事  
不单只是故事，  
更是  
生命历程的隐喻。

〔美〕贺琳·安德森 / 著  
Harlene Anderson

周和君 / 译 程婉若 / 审阅

# 合作取向治疗

对话 · 语言 · 可能性

Conversation, Language, and Possibilities  
A Postmodern Approach to Therapy

希望出版社



曹  
建  
民  
教授  
教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曹建民 主任医师  
教授  
主任医师 教授  
主任医师 教授

# 合作取向治疗

理论 · 技术 · 案例

Conceptual, Language, and Procedures  
of Participatory Approach to Therapy

---

大师的门

---

# 合作取向治疗

对话 · 语言 · 可能性

Conversation, Language, and Possibilities  
A Postmodern Approach to Therapy

---

〔美〕贺琳·安德森 / 著

Harlene Anderson

周和君 / 译 程婉若 / 审阅

---

希望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合作取向治疗:对话·语言·可能性 / (美) 安德森 (Anderson, H.) 著;  
周和君译, — 太原: 希望出版社, 2010.3  
(大师的门)

ISBN 978-7-5379-4607-0

I. ①合… II. ①安… ②周… III. ①精神疗法—研究 IV.  
①R749.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7164 号

CONVERSATION, LANGUAGE, AND POSSIBILITIES: A Postmodern Approach to Therapy  
by Harlene Anderson

Copyright © 1997 by Basic Books, A Member of the Perseus Books Group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Hope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sic Books, a Member of Perseus Books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译稿经张老师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希望出版社

## 合作取向治疗:对话·语言·可能性

作 者 / [美] 贺琳·安德森

翻 译 / 周和君

审 阅 / 程婉若

总 策 划 / 王素琴

责 编 / 王素琴

装帧设计 /  灵动视觉

出版发行 / 希望出版社

印 刷 /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印 张 / 20.75

开 本 / 787 × 1092 1/16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 图字:04-2009-002

版 次 /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379-4607-0

定 价 / 38.00 元

电话及网站 / 15601269102 www.psychotherapy.org.cn

E-mail / master\_door@yahoo.cn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序

美国心理学史家舒尔兹在他所著的《成长心理学》中讲过这么一件事：1920年，刚从大学毕业的奥尔波特途经维也纳，怀着期待的心情去拜访了弗洛伊德。

在他们会面的这天，弗洛伊德接待奥尔波特让他进入他的办公室，并请他坐下来，但没再说什么，而是等奥尔波特说话。沉默的时间越来越长，奥尔波特在世界著名精神分析学家的强烈而稳定的注视之下，变得局促不安了。

最后，急于想以某种方法开始交谈的奥尔波特，脱口说出他在乘有轨电车来弗洛伊德家时目睹的一件小事——一个四岁的孩子非常怕脏。这男孩认为他周围的任何东西都是脏的。他对他母亲诉苦说：“我不愿意坐在那儿。”“不要让肮脏的人坐在我旁边。”据奥尔波特看，这位母亲是盛气凌人的、极端整洁的，而且衣服“浆洗得很好”，他认为，这孩子对脏的厌恶显然来源于此。

在奥尔波特结束了他的故事之后，由于弗洛伊德像先前一样，继续注视着这个整洁而体面的年轻美国人，结果又一次地沉默了。然后，弗洛伊德问道：“那么，你过去也是这样的小男孩吧？”

由于这次会面，奥尔波特对精神分析产生疑问，转而研究人格心理学，后来自成一家之说。

谙熟精神分析的人对弗洛伊德的那一问当然颇能会心：每个人所说的东西都对应于他内心潜在的情感和冲突，这个提问很可能正好触到了奥尔波特内心的某个压抑的情结。但从奥尔波特这一面来说，他显然感到一种来自权威的压力，即便弗洛伊德所言不虚，这种方式也让他很难接受。半个世纪后，奥尔波特的质疑在以后现代主义为参照的心理治疗中得到了回应，一位名叫贺琳的心理治疗师和她的同事以不同的视角展开他们的工作，他们接待了大量有严重心理问题、被很多机构认为是难以治疗的来访者。这些来访者在讲述他们以往接受心理治疗的经历时，很多都会说到对于治疗师的相同的感受，如同贺琳在《合作取向治疗》一书中引用的那位母亲的话：“我们觉得他们有一套理论，不管是否适合我们，就想直接套用在我们身上。当它一再被证明效果有限，他们还是换汤不换药地继续使用。”“我们常觉得医生只听他们想听的话，其他部分就弃之不顾，不予置评。”正是出于对来访者的这类感受的尊重和思考，使得贺琳和她的同事从不同的角度探索现代心理治疗的可能性，《合作取向治疗》一书集中展示了他们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不断探索的成果。

现代心理治疗虽然流派众多，理论和实践方法各异，但其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人文关怀的呼唤，强调尊重和理解来访者，帮助他们走出心理困境，达到成长和自我实现的目标。如何尊重来访者？这个问题时常以悖论的方式或隐或现地渗透在临床工作中。比如，来访者选择了某个治疗师，对他呈现一系列材料，治疗师根据他的理论背景来理解这些材料的意义，采取相应的治疗方法。但如果同一个来访者换到另一个学派的治疗师那里，治疗师对于同样的材料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治疗方法也大相径庭。治疗师往往都会坚持自己的看法，把来访者可能提出的疑问视为某种需要克服的对治

疗不利的因素。在这个过程中，治疗师以一种预设的理论来看待来访者呈现的材料，并有意无意地成为解释来访者生活和经历的权威，引导来访者以同样的思路去探索自己的内心。问题是：这些理解哪一种更符合来访者的真实情形？或许这样的提问本身就是问题。关键不在于治疗师用哪种理论去理解来访者才是正确的，而在于来访者本身呈现了什么。基于这一点，合作取向治疗首先质疑的就是治疗师的知的权力。按照贺琳的说法，在合作取向中，治疗过程不再是“由治疗师主导的权力结构的组织与过程”，而是“观点与专业能力不同的人们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治疗师不是知者，他的知是通过交谈中他人呈现的知”。贺琳在书中反复重申的这个观点，从更深的层面引发了对于现代心理治疗中治疗师隐含的权力地位的思考。也就是说，尽管现代心理治疗师把平等、尊重、接纳视为治疗关系的核心，但当他们以预设的理论去解释来访者呈现的材料时，他们仍然在或多或少地扮演着权威的角色，来访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则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贺琳引用贝特森的话说：“不论我们努力治疗病人的动机本身有多么良善，但‘治疗’这个观念永远代表了权力的观念。”或者可以这样说：现代心理治疗是在新权威的基础上对主体经验的关注。所谓新权威，是指摆脱了传统价值观之后建立起来的新的价值体系和范式，它仍然是一种标准；后现代主义框架下的心理治疗则希望在没有权威的基础上关注个体经验，所谓没有权威，是指不把任何价值观作为标准范式，对于所呈现之物予以同等看待，从而聚焦于个体的独特经验及其意义。

当治疗师的权威作用逐渐淡化之后，不再由治疗师引导的来访者会发生什么情形呢？贺琳认为，他们会“拥有多重、语意建构的关系自我”，会与治疗师“一起参与创造他们所‘发现’的事物”，贺琳称之为“共同努力朝可能性迈进”。“可能性”是贺琳讲得比较多的一个词。对可能性的一种理解是，人对于自己的生活有多种想象，这些想象从理论上讲都有可能实现，但他只能选择一种。比如职业，在现实的选择排除了其他可能性之后，这种现实就成为他的生活方式。但其他可能性有意义吗？有的心理治疗理论或者把现实

选择之外的想象归为幻想，以此来解释来访者内心紊乱的原因，希望由此减轻内在冲突所引发的痛苦，或者把幻想看成一种带有防御性质的内心活动，认为是对内心某些缺失部分的补偿。但另一方面，对于现实生活情形之外的可能性的想象有可能包含着对于生活的积极的创造性姿态。从生活建构的角度讲，它涉及的问题是如何与现实衔接，使得某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情形。按照贺琳的说法：

当可能性增加，我们有一种自我能动性（self-agency）的感觉，这种感觉使我们能采取必要的行动，提出自己的关切或受到什么困扰：我们的困境、问题、痛苦和挫败；并且达成所愿：我们的企图、希望、目的和行动。

对可能性的重视为参与治疗的人营造出一个对话空间，使得日常生活中难以呈现的部分得以充分显现，这些部分同样是自我建构和成长的重要方面。

合作取向治疗的另一个特征是重视语言的作用。语言对于心理治疗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现代心理治疗对语言的应用大体偏重于三个层面：宣泄、表达、解释。从主体与客体的角度讲，这些方式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语言来获取某个对象或意义。在一般的治疗中，当来访者叙述一件事情时，治疗师关注的焦点通常会放在事情所包含的意义上，语言被用来阐述在讲述的背后隐藏的意义，以达成对事情本质的理解，获得某种领会。合作取向治疗对语言的看法受到维特根斯坦等人的影响，他们着重强调语言的叙述层面。依照传统的看法，人内心的改变主要基于他的感受和看待事物的观点的变化；而从合作取向治疗的角度看，一个人对他自身和事物的叙述本身就蕴含着改变的成分。在临床治疗中经常发生的情形是，来访者会以不同的方式讲述他们生活中的同一个事件，比如对某个家庭成员的行为，从恐惧、愤怒到谅解，通过反复的讲述，他们对事件的理解和感受发生了变化，这些不同的叙述构成了来访者与事件建立关联的不同的方面，同时也是来访者建构自身的重要途径。“这种一再描绘的过程，使得生命本身成为通过各种被述说的故事编织而成的布匹。”

《合作取向治疗》一书不仅引述了大量西方后现代作者的观点，将其融入



到对心理治疗的理解中，还详尽地呈现了作者参与工作的一些案例，一路读下来，如同置身于一条琳琅满目的画廊中，那些富于启发和挑战性的思想，不时让我眼前浮现出两千多年前一位对生命充满激情的中国智者做的一个梦：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现代心理治疗仍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假如有一种适用于一切心理问题的解决方法，那么只要掌握了这种方法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假如有一种对每一个治疗师来讲都是最好的理论，那么只要学会了这种理论就可以成为最优秀的治疗师了。到目前为止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想象。西谚有云：条条大路通罗马。对来访者而言，心理治疗只是他们了解和探索自己内心要走过的一段历程，这段历程有不同的路可以走，最终都能达到目的地。对治疗师来说，他自身的背景和特质决定了他的取向和所能到达的程度。并非每个哲学家都能循着苏格拉底的方式达到他那样的智慧，但他们却可能以自己的方式最终达到同样的对生命的洞悉。亦如作者在书中所说：古希腊的雕刻和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同样伟大。数年前，国内有的治疗师曾热衷于建构一种整合式的治疗方法，囊括所有学派的理论和技术，能解决一切心理问题，现在这种声音已然式微，原因多半是大家已经从对心理治疗的心浮气躁的理想式憧憬转向了实际的治疗工作，体会到了各种心理治疗方法和理论的长处和局限。不再幻想自己能解决所有来访者的问题，这正是治疗师心态不断成熟的一个标志。当治疗师回到自身真实的状态，他才能专注于与来访者的工作，真正在治疗中充当合作者与助人者的角色，协助来访者激活并发挥他们生命中蕴含的巨大的康复和创造潜力。如歌德在《浮士德》中所说：

你不用为学问东奔西忙，

一个人只能学到他所能学到的东西。

李小龙

武汉心理医院

## 聆听案主的“道”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老子《道德经》

打从我在德州攻读婚姻与家庭治疗硕士学位起，就对治疗师所抱持的理念与思维的运用十分感兴趣。有一次在团体督导中，我的同学提出一个伴侣治疗的工作片段来讨论，她提到在治疗中的挫折与无力感，希望通过督导找到突破与新的工作方向。当时，担任督导的教授是以擅长鲍文（Murray Bowen）学派著称，于是他从鲍文学派的观点来讨论这对夫妻之间的“焦虑”（鲍文认为焦虑是导致个人在关系中分化不清的根本因素），督导我们的教授建议我的同学处理夫妻在各自原生家庭中分化不清的议题。大家根据家庭图及治疗师提供的个案信息热烈讨论，并给予治疗师许多可能切入的方式。坐在其中的我虽然一语不发，聆听所有人的想法，但是心中的困惑却愈来愈大。

在团体中沉默的人总是会引起许多关注，于是我决定提出我的困惑：当我们带着某一治疗学派来看待或诊断案主的问题是，是否我们只看到我们想看到或听到我们想听到的？与此同时，案主的声音会因此而沉默了吗？倘若案主有机会听到我们的讨论，他们会怎么想？而这些问题常常萦绕在我的心中，在我的每一次的治疗及督导的工作中。作为一个治疗师及督导，我常常留意我“知”些什么，不“知”些什么，以及我是如何知道我的知道和不知道。

倘若从老子的观点来看，治疗师对于案主的问题所持有的“道”（以老子的语言来说）——无论是焦虑或自我分化不清——可能并非是“常道”或是“王道”。然而，被认为是所谓的专家的治疗师所持的“道”，往往是凌驾于案主对他们所处的困境的理解之上的“道”。我想，作为一个专业的助人工作者，是有必要反身凝视我们的在与案主工作中的姿态并检视我们的“道”了。

## 后现代家庭治疗经典

本书作者贺琳·安德森是合作取向治疗——与焦点解决、叙事治疗并列于后现代家庭治疗大伞之下的门派的创建者之一。合作取向治疗始于以哈洛·古利辛（Harry Goolishian）为首的一群治疗师在德州盖维斯顿一个医学中心进行的多重影响治疗研究计划，贺琳在1970年加入这个工作团队，这个工作团队早期受到大卫·杰克森（David Jackson）、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及加州帕洛艾图（Palo Alto）的精神研究所的影响很大，之后，这个工作团队接触更多当代诠释学者，像伽达默尔（Gadamer）、哈贝马斯（Habermas）和海德格尔（Heidegger），哲学家德里达（Derrida）和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等，及社会建构论学者肯尼斯·葛根（Kenneth Gergen）的工作，并且不断从实务工作及与其他治疗师的交谈中汲取经验。20世纪80年代初期，贺琳和哈瑞·葛鲁森对治疗、系统、语言、治疗师的角色、治疗关系提出极有创意而有别于传统家庭治疗典范的新观点，至今，他们的观点不只受到美国境内治疗师的欣赏，也在国际婚姻家庭学者及治疗界大放异彩。

开始认识贺琳是通过她的书籍文章、工作坊及研讨会，在这些初期的接触中，贺琳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对于治疗该如何做一向着墨不多，但是在治疗、关系及治疗师的角色等议题上则有极为深入的思考及新颖的观点。于是，我开始检视我的“知”与“不知”以及认识“知”的建构过程。这对我的治疗工作带来很大的影响，让我对案主如何建构他们的“知”也非常留意，对他们在关系及文化脉络中如何理解他们的生命经验、关系及事件更有极大的兴趣。

我还记得有一次，一位由儿童精神科医师转介来的母亲带着十一岁的儿子跟我会谈，她悲伤地诉说这孩子被诊断是躁郁症，终其一生需要靠药物来协助病情。她希望我能够改变她的儿子。而那名十一岁男孩看似极为愤怒地坐在一旁沉默不语。通过交谈我获悉这位精神科医师是如何做出诊断及案主是如何理解与经验所谓的躁郁症；我也理解躁郁症对他们家庭关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随着进一步的交谈展开，我更学到这个家庭对他们经历过许多重大生命事件的观点和意义，例如家人的分离及离婚等。在展开治疗一个半月之后的一次会谈中，这沉默的男孩终于含泪愤怒地告诉母亲他不是躁郁症患者，他说他的“愤怒”是对父母亲离婚的抗议和伤心的表现，他的“忧郁”乃由于对离开的父亲怀有无法言喻的思念。通过更多的交谈，这位母亲与男孩对离婚、家庭关系及躁郁症诊断的“知”都有了新的观点，最后这位母亲带着男孩回到精神科医师的办公室，亲口告诉医师：“我的孩子不是躁郁症。”

治疗结束后的六个月，在与这位母亲的电话联系中，她告诉我她的儿子已经重回学校且学习表现令她十分骄傲，他们的关系也非常好。从治疗的谈话中她了解儿子对父亲的爱和深刻的思念，因此多次主动安排他们见面或共度周末，但她也常常看到儿子因父亲不能前来或临时爽约的伤心和失望，她告诉我她非常心疼儿子经历从满怀期待到失望溢于言表的情绪“三温暖”，但是这也给了他们更多的机会讨论他们正在创造的新的家庭关系和面貌。她也告诉我她有一个正在交往中的对象，她很感动儿子对她的新感情给予最深的祝福。

这是一个让我十分感动的家庭。我想通过这个治疗经验来简单地讨论许多心理专业工作人员对带着后现代/社会建构论观点的合作取向治疗会有的误解和疑虑。首先，对于诊断，合作取向治疗师并不否定它的重要性，而只是有不同的观点。葛根（Gergen）认为，诊断例如上述的家庭的“躁郁症”，是心理专业人员的语言。治疗师通过这个特定的语言来了解他们的案主。诊断虽有助于治疗师、案主和家庭缓解他们对所谓的症状行为发生的焦虑，和对症状行为发生的处置较有信心，但诊断也可能同时窄化了治疗师对案主和家庭在他们生活脉络中独特的自我呈现的理解，同时也阻碍了治疗师对其他可能影响症状行为脉络因素的了解，例如，经济结构的缺失或社会政策的改变。合作取向的治疗师在面对诊断时常常会思考下述的问题：诊断的意图是什么？治疗师的哪些问题通过诊断被回答了？我们运用诊断在沟通些什么？和谁沟通？如何让诊断对系统中的成员（例如：家庭、学校老师、社工员、法官/律师等）来说是有意义的？如果案主有机会用他们日常生活的语言来描述他们的自己及关系，而不是治疗师运用的专家语言，〔例如：她是“童年乱伦的成人幸存者”（adult survivor of childhood incest）、母亲与孩子之间的界线不清、案主是一个“过度保护的”父亲等。〕他们会怎么说？合作取向治疗师有兴趣并邀请所有参与系统的成员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和语言来述说他们的生命故事，因为如同贺琳在本书中不断强调的：案主才是他们生命和关系的专家。

此外，无论是在美国或台湾，我经常被我的学生、接受我督导的治疗师、参与工作坊的成员及对合作取向有兴趣的同事问到：合作取向治疗是如此的哲学取向，并且看重语言的运用、叙事和意义的创造，是否这个治疗取向只适用于认知能力强、合作意愿高又善于表达的案主？其实不然。我曾有幸在休斯敦盖维斯顿中心与贺琳及其他的治疗师工作，多年来我们一直都是休斯敦儿童保护中心及小区青少年服务中心的合约机构，所以，除了一般自费的案主之外，我们工作的对象大多是从法庭、学校或儿童保护局转介来的所谓的非志愿案主。这些案主中有许多儿童及青少年，其中部分的家庭是由墨西

哥移民过来，他们的英语能力十分有限，而且对于参与治疗没有一点儿意愿，但这些种种的情况并不妨碍我们与他们在一起的工作。我记得在与一位儿童保护局控诉未尽保护之责导致孩子被她的男友虐待的母亲进行第一次谈话时，她愤怒地告诉我儿童保护局的工作人员说谎，承审此案的法官不公正，他偏信儿童保护局的说法。她否认儿童保护局一切的指控，并且失望于他们对她的偏见且不相信她，她甚至怀疑地质问我，我是否与儿童保护局的工作人员和法官一样不相信她？除了尽我最大的力量回答她对我的所有的疑问，我很有兴趣地想知道：哪些事是她希望我相信但儿童保护局和法官不相信的？她说：“我希望你相信我是一个好母亲。”这位母亲仅有中学肄业的学历，但却一点都不妨碍她对母职观点及作为一个女人的需要的表达。她也与我谈到了她对自己的看法及儿童保护局和法官对她的看法之间的冲突，以及在不同现实角力中的权力议题。

部分与我工作的儿童及青少年有表达上的困难。例如，我曾与一位在特殊学校就读、语言发展迟缓的青少年工作，在谈话的初期我对于她的沉默及不时耸肩的反应感到挫折，在某次与她的老师谈话中，我意外地发现她对雕塑非常有兴趣，于是我通过雕塑来和她交谈，通过一个又一个她个人雕塑的作品及她和我共同雕塑的作品诉说她的生命故事和经验，并赋予意义。口语的语汇（verbal language）常是成人之间惯用交谈、发展意义的主要方式，但是对于儿童及不擅长表达的青少年，治疗师可能需要学习并运用案主通常与他人联结的方式。而贺琳在本书中提出治疗师的态度——不知（not knowing）、不以专家的姿态出现、对案主有更多的好奇——对创造与这类型的案主的交谈空间有很大的帮助。

目前在台湾大部分的治疗师或咨询师对合作治疗取向仍然很陌生，在返台任教的初期，我对于督导学生的咨询工作有些许担心。主要的原因来自于学生受到传统咨询督导的模式影响，致力追求咨询技术的精进，督导的关系常常是一个上对下的关系，因此，在督导的过程中，督导的意见往往被视为“唯一”是可以想见的。但是当我带着合作取向的思维及态度与受督导的学生

一起工作时，我发现他们十分享受对话 / 交谈的过程，他们开始讨论他们自己对咨询助人工作的看法，并且挑战他们对咨询关系抱持的信念，他们发现他们常常希望能帮助案主做到“案主自觉”，但是往往又引导案主朝向他们希望案主能改变的议题上去。这些挣扎与两难在交谈的过程中重新找到了意义。我的学生也开始将这样的对话方式带入他们与案主的咨询工作中，他们发现当他们谦虚地向案主学习时，他们与案主更靠近了，并且他们看见更多的可能性。

## 我眼中的贺琳

2005年初春，我很幸运地能到贺琳的休斯敦加维斯顿中心工作。春末夏初，正当我打包准备搬去休斯敦之际，收到贺琳一封诚挚又温暖的信函，欢迎我加入他们的工作团队。日后在与贺琳密切合作的治疗、教学及督导工作中，我对她的特质及合作取向治疗的认识都与日俱增。在工作上她总是鼓励我，并给我最大的空间去尝试我的想法。她对人的关心和爱总是化为具体行动来表达，犹记得我刚到休斯敦人生地不熟时，贺琳常邀请我出去吃饭，帮助我熟悉休斯敦的环境，在我一边工作一边进行博士论文研究时，贺琳非常关心我的研究进度并与我分享许多她自己的研究经验，也经常主动问我需要什么协助。记得有次我和她一起去学生的实习机构拜访，在与机构督导交谈中，她发现该机构服务的案主群中正好有一些符合我的研究样本条件，而当时我正在为找寻研究受访者烦恼，她马上和机构督导讨论我的研究，并积极促成机构与我在研究上的合作，令我十分感动。

最让我感动的一次是我离开休斯敦，开始在纽约一所大学任教，面对陌生的环境和全新的工作挑战，我适应得很辛苦，在多次电话及电子邮件往返中，贺琳决定来纽约探望我。当时我并不知道她来纽约之前，其实忙碌于欧洲、亚洲及北美工作的邀约，长途飞行和时差让她的身体十分疲累，但她仍依约飞来纽约。她告诉我虽然她很累，但一定要来看我，因为她知道这对我

很重要。与她拥抱时，温暖浮上心头，一股热泪早已盈眶，那天工作结束后，我们两人一起去享受美食，欣赏舞台剧，漫步在时代广场上，那是我来纽约之后第一次开怀地笑。

## 给读者的小建议

合作治疗是一个十分哲学取向的治疗。在这本书中贺琳甚少着墨于治疗技术，而是不断地提醒治疗师对自己的认识论的反思、强调创造与案主的对话空间及对案主的生命及关系困境共同赋予的意义。从学生、受督导的治疗师及参加工作坊的成员的反应中，我看到他们对合作治疗取向十分欣赏，但常常觉得不知该如何着手。我的建议是：治疗师可以开始对自己在治疗中的每一个介入或是建议反思自己的意图，去探索自己的“知”与“不知”，并进而检视自己看待所谓的“问题”及治疗关系的框架，了解我们看案主问题的视角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所见”及同时限制了我们的理解，当我们能够不再对自己的“知”视为理所当然并且开始能够谦虚地请教我们的案主，聆听、尊重并积极地参与案主的故事及其呈现方式，我们便打开了许多的可能性。举例来说，我督导的一个治疗师来告诉我她觉得她似乎越来越不知道如何与她正在咨询的一位有身体残障的案主继续工作，这位长期需要依赖轮椅的案主对于自己心仪的女孩迟迟不敢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意，因为害怕耽误女孩的终生幸福，他决定在角落默默地守候着她。而这位咨询师着眼于案主的幸福，在谈话中不断地暗示他应该勇敢地追求女孩并创造自己的幸福，但是另一方面咨询师又不断地想起在课堂上老师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尊重案主的决定”。咨询师带着她的两难来找我，并希望我告诉她能怎么做。在交谈中，我们了解了她鼓励案主追求心仪的女孩其实是对案主的爱与关怀，她希望案主像所有的人一样可以得到幸福。在她更清楚她的意图之后，她明白她仍是十分尊重案主的决定，但她希望能够与案主在“幸福”这个主题上有更多的交谈。我想合作治疗取向并不是要你丢弃你现有的工作方式或信念，而是鼓



励你检视你的认识论并且提供不同的治疗思维，期盼能带来不同的可能性。

贺琳这本书是后现代家庭治疗非常经典的作品之一。本书除了英文之外，已经以六种语言发行，包括丹麦文、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文及瑞典文。我非常高兴本书能发行中文版。非常感谢本书编辑的所有努力，让中国的读者有机会读到这本书。我希望通过本书能与中国各地区的专业人员有更多的交谈，共同提升我们对个人、家庭及社区的专业咨询工作。

程婉若

2010 年春写于台湾嘉义